

〈論文〉

试论遣唐使时代有关“留学”的区别称呼

遣唐使時代の「留学」の呼び分けについて

泉 敬 史

前 言

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推古天皇十六年(608)九月，“唐客裴世清”归国之际，推古天皇再次任命小野妹子为遣隋大使，“陪同唐客”入隋。此次随同遣隋使入隋的还有学生及学问僧各四名。这是史籍中有关日本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及学问僧的最早记录^①。

然而，虽然笔者现在记之为“留学生・留学僧”，在《日本书纪》的相关记事中却只出现“学生・学问僧”，并没有使用“留学”的字眼。如果留意这一点，并继续考察以《六国史》为首的日本史籍，就会发现，对海外留学这一个行为，有“留学”，“还学”，“求法”，“游学”，“请益”等各种不同的称呼。例如，曾在唐生活十八年的吉备真备被记作“入唐留学生”^②，与他同时随遣唐使入唐，并在次年搭乘同船回国的大和长冈则被称作“入唐请益”^③。对于不同称呼各自所具有的不同含意，以下所示之解释已成为周知的认识。

1，学问僧是指“长期留在唐及新罗学习的僧侣”，“短期学习的情况则被称作请益”^④。

2，“所谓留学生，是指入唐以后，长期在唐钻研学问之人。与此相对，还学生是指随同遣唐使往返者”^⑤。

3，“所谓学问生和学问僧，是指长期留学，历经数年充分研究学问之留学生和留学僧。

而请益生和请益僧，则是在入唐以前，已进行过一定程度的研究和修行，是某一领域的专家，且具有相当地位之人，其入唐是为研究其专业领域的特殊问题”^⑥。

然而另一方面，正如森氏所指出的“遣唐使初中期所未见的请益，还学之名称，在日后被逐渐使用”^⑦伴随着对大陆文化的更多摄入，意指赴中国及朝鲜半岛留学的措辞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例如，“留学生”的称呼最初是用于在日本朝廷中官至右大臣的吉备真备身上^⑧，在此之前的留学者们则被称作“学问生”和“学问僧”。

那么，最初仅以“学问”一词表达的古代日本海外留学，为何在日后会被冠以各种不同的称呼呢？众所周知，初期的留学生及留学僧往往历经二、三十年在唐钻研学问，而随着时

代的推移，留学时间被逐渐缩短。对于这种现象的解释，多是认为由于随着海外文化的不断摄入，初期留学者们在单纯而强烈的求知欲驱使下的对未知文化的饥渴感逐渐减弱。此外，财政问题与中国社会的混乱状况相重叠，也使日本人的心中产生了对学习海外文化之事认识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古代日本社会，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海外新文化，在日本人心中的形象是处于变化之中的。过去，“留学”一词与“学问”同义。所谓做学问，是指赴海外学习。然而，不久，海外学习之事就被区别称呼，呈现出多样化。

关于遣唐使的时代区分，已有许多学者作过研究。例如，木宫泰彦将遣唐使分为一至四期^①，森克己分之如初，中，后三期^②，王勇将其分为前后两期^③，王金林有关区分的时期基本沿袭木宫泰彦的说法，只是根据派遣目的的不同提出了新的四期说^④。

作为遣唐使派遣的主要目的，海外文化的输入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日本人对此文化的认识在整个遣唐使时代有所改变，那么，这种变化应该也可以成为时代区分的标志。本文试图通过对“留学”之各种称呼的考证，论述古代日本社会“文化”之演变。

①汪向荣《古代中日关系史话》三十八页，一九九九年二月，中国青年出版社。

②《续日本纪》。

③岩波古典大系《续日本书纪》一百十四页。

④王勇《圣德太子时空超越》三五三页。

⑤森克己《遣唐使》一百十四页。

⑥森克己前揭书一百十六页。

⑦《日华文化交流史》一九五五年。

⑧《遣唐使》一九六六年。

⑨《从唐看遣唐使》一九九八年。

⑩“遣唐使的使命及在东亚交流中的地位”，《亚洲游学3，东亚的遣唐使》所收，一九九九年。

一、最初的留学者

依据《日本书纪》的记载，日本（倭国）最初的海外留学者是一位女性。她就是“佛教私传”的主人公鞍部村主司马达等的女儿岛^①。她也是留名《日本书纪》的我国最早的佛教出家人^②。她在出家以后改名为善信尼，为了学习佛教受戒法，她向大臣苏我马子提出了赴百济留学的请求，并得到了准许。《日本书纪》中的相关记载如下所示：

苏我马子宿弥，请百济僧等，问受戒之法。以善信尼等，付百济国恩率首信等，发遣学问^③。

学问尼善信等，自百济还，住樱井寺^④。

在此，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日本最初赴海外留学的尼姑被称为“学问尼”；其二，留学地是在百济；其三，赴海外留学学习佛教被称做“发遣学问”。

- ①《扶桑略记》钦明天皇十三年条。“第二十七代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壬寅。大唐汉人案部村主司马达止。此年春二月入朝。即结草堂于大和国高市郡坂田原。安置本尊。归依礼拜。举世皆云。是大唐神之。”
- ②《续日本纪》敏达天皇十三年条。西历 584 年。
- ③《续日本纪》崇峻天皇元年条。西历 588 年。
- ④《续日本纪》崇峻天皇三年条。西历 590 年。

二、最初的区别称呼

接下来有关留学的记载见于《日本书纪》推古十六年(608)九月条：

是时，遣于唐国学生倭汉直福因，奈罗则译语惠明，高向汉人玄理，新汉人大国，学问僧新汉人日文，南渊汉人请安，志贺汉人慧隐，新汉人广济等，并八人也。

在此，初次见到“学生”与“学问僧”的区别称呼。“学问僧”与“学问尼”的称呼差别只是因为性别的不同。而透过“学生”的称呼，我们可以发现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的出现。第一，并非僧侣的普通人的留学。第二，为学习佛法以外的知识赴海外留学。这两种现象的出现，表明了文化之领域与概念的扩大。

下面，我们将对古代日本社会首次出现的“学生”进行考察。

三、“学生”的登场

始于七世纪初的遣隋使的派遣，是推古朝时期对外政策的特点。特别是推古十五年(607)派遣的遣隋使一行，中国史书《隋书》明确记载其是为“学佛法”而来，表明了佛法的摄取作为国之大计受到相当的重视。然而，推古朝所希望摄入的东西并非仅仅是佛法，该点从下述三件事中得到了证明。

第一是“冠位十二阶”的施行。这是推古十一年(603)制定，翌年正月开始执行的新的身分秩序。这一制度一直持续到百年后大宝律令的实施，为律令制度的前身。推古朝的冠位分为德，仁，礼，信，义，智六个德目，明显可见中国文化之影响。

第二是同年四月施行的“十七条宪法”。众所周知，经圣德太子之手完成的这项宪法，不仅受到佛教，也受到儒学的强烈影响。也就是说，为了建立国家新秩序，推古朝积极地吸取并非仅限于佛教的各种中国文化。

四、文化的派生

第三是文化的派生。文化不是以单独的形态传来的。例如，伴随着骑马技术的传入，马具，骑马装束，马上使用的武器以及马的繁殖与调教知识等也一并传入。与此相同，佛教也不可能只是传入思想和信仰，从佛具，僧衣，到经典，经论，佛像及佛教建筑，佛教文化以其博大精深的形态被日本人所接受。也就是说，积极引入佛教的同时，也必须全面接受与此

相关的整个文化世界。这正是文化所具有的影响力和派生力。推古朝时期“学生”的出现，表明了大和朝廷在承认文化所持有的巨大影响力的同时，也采取了与此相对的政策。他们视线所及的中国文化，并非仅仅是僧侣及佛教文化所能应付的。正因为此，设定了“学生”这一新的留学身分。

最初被任命为“遣唐学生”的四人中，高向玄理特别有名。他于舒明十二年(640)回国，在唐前后度过了三十三年的留学生活。在七世纪初的日本，文化的确是需要一生去攀登的高峰。

五、留学者详情

《日本书纪》中登场的留学者共有五十二人。当然，这只是留名史籍的人数，并非实际留学者总数。如果将这五十二人的留学地及留学身分作一总结，其结果如下：

	留学僧	学 生	合 计
隋 唐	35	10	45
百 济	1 *	0	1
新 罗	6	0	6
高句丽	0 **	0	0
合 计	42	10	52

* 该名为善信尼，《日本书纪》中记之为“善信尼等”，因此，应该不只是一人。

** 虽然记载中未见个人的姓名，但可见孝德元年(645)“高丽学问僧等”的记述，因此，派遣数不应是零。

由上表可得如下结论：(1)留学地以中国为主；(2)学生的派遣地只限于中国；(3)留学僧的数量超过学生数。无论如何，在《日本书纪》的时代，海外留学者只具有“学问僧”或是“学生”的身分。也就是说，所谓做学问，与赴中国或朝鲜半岛学习之行为直接相关，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崇拜及强烈渴求海外文化之时代感。

六、“僧”与“学生”的区别

那么，赋与海外留学者“学问僧”与“学生”的两种身分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呢？在视“留学”与“学问”为同一概念的当时社会，除了僧籍与俗籍的区别，还有什么其它的不同吗？一般来说，很容易想到的是，既然是僧，就一定是专门研究佛法及与佛教相关的知识，而学生则是学习其它领域的知识，然而，仅限于《日本书纪》的记述，我们就会发现这一想法并不正确。

如前所述，推古十六年与遣隋使小野妹子同行赴隋的学问僧南渊请安，在异国度过了三十年的漫长岁月后，于舒明十二年(640)回国，以后四年间的消息未见于《日本书纪》。皇极三年(644)正月，在玩一种踢球游戏中与中大兄皇子相识的中臣镰足，为了加强与年轻皇子的关系，开始与皇子同赴“南渊先生之处学习周孔之教”，此处之“南渊先生”即是从前的学问僧南渊请安，而所谓“周孔之教”无疑就是指中国儒学。此外，与请安同时渡海的僧日文，也参与了大化五年(649)八省，百官这一新官制的文案起草。他们均在佛法与佛门的领域之外发挥着自己的知识与才能，这与后来的情况有较大的不同。例如，约百年后，僧玄昉与入唐留学生吉备真备同时从唐归国，属于僧籍的玄昉带回了“经论五千卷及诸佛像”，而身属俗籍的吉备真备则带回了《唐礼》，《历经》，乐器及武器等，从中可见其各自分担的不同。在早期的认识上，学习海外文化，也即所谓的做学问，最初是委托僧侣进行的。前表所示之超过学生数四倍的学问僧数，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然而，随着文化涉及领域的扩大，这种局面已变得难以维持，逐渐出现了从俗籍身分者中选用学问者的情况，这即是“学生”这一新称呼出现的经纬。也就是说，在这个时代，文化已超出了僧侣们所能控制的范围，实现了大踏步的飞跃。这也为遣唐使时代迎接文化最盛期注入了活力。

七、遣唐使时代

与《日本书纪》记载了从神代到持统朝时期漫长的历史相对，《续日本纪》只留下了从文武元年(697)到延历十年(791)约百年间的记录。然而，如果仅考虑本文所论及的“留学”这一问题，就会发现，《日本书纪》与《续日本记》分别记载了自崇峻元年(588)善信尼首度海外留学以来的百年及其后百年间的历史。如果顺便看一下《续日本纪》以后的史书，就可知《六国史》中剩下的四部，即《日本后记》，《续日本后记》，《日本文德天皇实录》，《日本三代实录》记载了其后的百年间的历史。

到九世纪末遣唐使派遣画上终止符的大约三百年，日本政府一直持续派遣公费留学者，在法律上，遣唐使废止后的十世纪初完成的《延喜式》卷三十中，也继承了有关对留学者赐禄的规定。以国家形态追求的文化交流如此长期且持续地进行，在世界史中也极为罕见。而且，在当时幼稚的航海技术下，留学者随时都有可能献出宝贵的生命，因此，遣唐使时代的确是一个不断追求海外文化的时代。

八、新的区别称呼

如前所述，《续日本纪》记载了从七世纪后半期到八世纪后半期大约百年间的历史。这百年时间占了日本向隋，唐两王朝持续遣使时间的三分之一，与此相对，遣使的回数大约有一半集中于此，无愧是摄取海外文化气氛最高潮的时期，意味着“留学”的各种用语也在这

一时期开始出现。留名《续日本纪》的留学者共有二十四人，留学地分别是唐，新罗，高句丽，渤海四国。百济和高句丽在这个时代已经灭亡，然而，高句丽作为归国者的曾经的留学地，其国名尚见于史册。现仿照前表归纳如下：

留学地	僧 籍	俗 籍	合 计
唐	8	7	15
新 罗	6	1	7
高句丽	1	0	1
勃 海	0	1	1
合 计	15	9	24

与前表相比，留学者中俗籍所占比例有所增加，而向唐以外的国家同时派遣俗籍留学者这一点与前表有较大不同。

此外，颇令人寻味的是，虽然留学人数有所增加，然与留名《日本书纪》的五十二人相比，留名《续日本纪》的人数减少了一半。这大概是因为在《日本书纪》的时代，留学被视作是件值得记载史册的重大事项，而在《续日本纪》的时代，随着留学的普遍化，除非是特殊事例，留学者很少有留名史册之故吧。以下，我们将这二十四人按留学身分进行分类。

身 分	僧 籍	俗 籍
随使人唐	2	1
留 学	2	2
学 问	9	3
请 益	0	2
游 学	1	1
不 明	1	0

可见，出现了“随使人唐”，“留学”，“请益”，“游学”等各种新的称呼。其中，“留学”与“请益”两项，在天平七年(735)的记事中同时首次出现。此外，“游学”的名称只限于赴朝鲜半岛留学者，并不适用于赴中国留学之人。

九，与四国的外交关系

遣唐使时代日本的国际关系，基本上限于在四个国家之间展开。

首先是唐。唐常被称作大唐，是先进文化的发祥地。其次是朝鲜半岛，这个时期的朝鲜半岛国家是新罗。日本与新罗的使节往来是以属国新罗的朝贡为原则的。最后一国是八世纪

初建国的勃海，有关其首次来访的记事见于神龟四年(727)，圣武朝视其为与新罗同样的属国加以对待。后两国常被称作“蕃国”，其使者则被称作“蕃客”。

《日本书纪》中朝鲜半岛被称作“三韩”，百济，高句丽，新罗分别被称作“百济(国)”，“高丽”，“新罗(国)”。从某一时期起，逐渐演变为“蕃国”这一带有蔑视性的称呼。

如前所述，日本最初留学者善信尼的留学地是在百济。这是六世纪后半期，苏我氏在积极引进佛教政策下采取的一项派遣行动。此外，除了百济，日本也向朝鲜半岛的新罗和高句丽派遣学问僧。从自古百济五经博士的派遣，到以圣德太子的家庭教师扬名的高句丽僧慧慈等，半岛的各个国家对日本而言无疑是先进文化的摄取地。因此，在《日本书纪》的记事中，我们找不到称这些国家为“蕃国”的事例。不管政治上的内情如何，在文化面上，半岛国家的地位是得到公认的。

十，半岛的“蕃国”化

然而，在进入《续日本纪》时代以后，情况有了急剧的改变。“蕃”这一字眼最初见于大宝三年(703)四月文武天皇追悼新罗孝昭王去世的诏书中。其中，天皇称新罗王为“蕃君”，称其使者归国为“还蕃”。新罗在统一朝鲜半岛后，失去了视日本为宗主国的必要，因此也逐渐懈怠了对日本的臣下之礼，两国关系开始走向恶化，这是后话。在这一阶段，日本视新罗为“蕃国”也是日本当时采取的一项外交方针。一方面，在文武三年(699)的记事中，日本自称为“中国”，从中已可见“小中华思想”。过去被尊为师的半岛诸国，其地位急剧向“蕃国”转变，这种变化不容忽视。与此变化相对应，《日本书纪》中全被记作“学问”的海外留学，这个时候开始出现针对朝鲜半岛的“游学”。视学习海外文化与“学问”同意的社会意识，随着时代的推移不断变化，最终出现了针对学习半岛文化的“游学”之用语。“做学问”转变为“游学”后，文化明显有了优劣之区别。

结 语

如上所述，古代日本的留学者，由僧籍向俗籍扩大，学习内容也超越了佛法之范围，进而，海外文化被区别对待，有了优劣之差别，留学者的身分因此变得多样化。本文试图以“留学”用语之多样化为线索，考察其变化的产生，然而，最终只不过是介绍了其变化的片段。例如，向朝鲜半岛中的“蕃国”“游学”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最初所谓的“蕃国”，是指文化与礼节之未开化之地，即使被称作“游学”，也是去学习，向一个未开化之国学习，这在道理上很难说得通。此处明显可见用语上的矛盾，因此，仅凭用语的变化，是不可能论述当时社会实态的。然而，也正是这种矛盾，使我们得以窥见当时社会的变貌。关于这一问题，将留待另文论述。